

傅山的世界

十七世纪
中国书法的
嬗变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白谦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FU SHAN' 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傅山的世界
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

白谦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 (美) 白
谦慎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9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
ISBN 978-7-108-05300-8

I. ①傅… II. ①白… III. ①傅青主(1607~1684)
— 书法评论 IV. ①J292.1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6022号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Qianshen Bai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3
Copyright ©200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 of Harvard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此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译增订版)

作 者 白谦慎
初 译 孙静如 张佳杰
审订改写 白谦慎
特约编辑 刘 涛
图片编辑 黄思恩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胡长跃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5-2029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北京第1版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22.75印张
字 数 240千字 图版190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75.00元

总序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31篇；而巫

鸿在 1989 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包华石 (Martin Powers) 在 1991 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 (Craig Clunas) 在 1991 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巫鸿在 1995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 (Lothar Ledderose) 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大规模与模件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乔迅 (Jonathan Hay) 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écor, Pictographs, 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 等都是 2000 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唯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尹吉男

2005 年 4 月 17 日于花家地西里书室

谢 辞

本书的英文版是根据我199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我在耶鲁大学的导师班宗华教授（Richard Barnhart）和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乔迅（Jonathan Hay）、石慢（Peter Sturman）教授的建设性意见已为本书所采纳。

哈佛大学艺术史系的汪悦进教授首先建议我将书稿投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John Ziemer先生对本书英文版的出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方尔义兄（Matthew Flannery）和李慧闻女士（Celia Carrington Riely）曾先后修改了我的文稿。

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美国盖梯基金会（Getty Foundation）、日本Metropolitan Center远东艺术研究基金会赞助了和本书相关的研究工作。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为本书提供了他们藏品的照片。波士顿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Jeffrey Henderson教授和Metropolitan Center远东艺术研究基金会资助了本书图版购买和制作的部分费用。

台北石头出版社社长陈启德先生雅好中国书画，在他的领导下，石头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品位的中国书画学术著作。拙著在哈佛大学通过审核并纳入出版计划不久，陈先生即向我表示了由石头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的愿望，并嘱咐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黄逸芬小姐和我接洽翻译事宜。孙静如小姐、张佳杰道兄承担了全书的翻译工作。老友刘涛兄担任本书的特约编辑，在百忙之中仔细润色了文稿。缪哲兄审读了书稿，薛龙春兄仔细阅读了全书的校样。石头出版社的黄思恩小姐做了大量细致的编辑工作，使本书繁体字版得以顺利出版。

多年来，我的研究得到许多师长、朋友、同道的帮助。我于1986年秋负笈美国，最初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89年夏秋之际，我在考虑转行时，是张充和先生和王方宇先生推荐我到耶鲁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史。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经常

向张先生请教。而我对17世纪中国艺术的兴趣，则受到了八大山人专家王先生的启发和鼓励。十多年来，我在收集明清艺术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汪世清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最多。

此外，我还得到以下诸位前辈、师友、同道的指导和帮助：翁万戈、刘先、张子宁、沈津、何慕文（Maxwell Hearn）、艾思仁（Soren Edgren）、路思客（H.Christopher Luce）、Stephen Addiss、韩文彬（Robert Harrist, Jr.）、John Curtis 夫妇、Randy Smith 夫妇、林秀槐、巫鸿、熊存瑞、王如骏、杨晓能、龚继遂、冯象、商伟、刘和平、陈维刚、刘皓明、王朴仁、高翔、傅申、何国庆、朱惠良、王正华、吴展良、何传馨、李郁周、陈维德、蔡明璜、张建富、陈瑞玲、杜三鑫、吴国豪、叶承耀、黄仲方、刘九庵、赵宝煦、林鹏、陈梧桐、方德楨、李德仁、姚国瑾、华人德、曹宝麟、丛文俊、潘良楨、黄惇、孙晓云、穆棣、沈培方、刘恒、唐吟方、余正、黄南平、祁小春。

我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的同事对我的研究工作一直予以热情的鼓励。

多年来，我的妻子王莹和儿子白睿一直和我同甘共苦。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教育孩子的工作，使我得以专心研究、写作。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开始学习书法的。最初由我在上海财贸学校的语文老师任珂先生介绍认识了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萧铁先生。以后我还先后在王弘之、邓显威、金元章、章汝奭诸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除了老师的教导外，我的父母和许多前辈、朋友们也都曾经给予我各种各样的教诲和帮助。尽管其中有些师友和我已多年没有联系了，但他们对我的教诲、帮助、期望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

值此简体中文版《傅山的世界》出版之际，我怀着感激之情，向所有教导和帮助我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白谨怡

2005年12月24日于波士顿

致中文读者

2002年夏，我在台北访问石头出版社，观赏陈启德社长的书画收藏。听说英文版《傅山的世界》出版在即，陈启德社长表示了出版中文版的愿望。最初我并没有同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近十年来，我用中文发表了十几篇关于17世纪中国书法的论文，这些论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比较具体丰富，我一直计划将它们结集出版。另一个原因是，英文版《傅山的世界》是直接用英文写的，英语的写作，讲究叙述的线性流动，有时反不如中文那样具有包容性。而且，由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仍然是一个相当生疏的话题，为了照顾西方读者，我在书中要介绍许多十分基础的背景知识。把它译成中文，我总担心会比较单薄。但后来觉得，作为一本书，《傅山的世界》虽不如我的论文在讨论相关问题上那样具体深入，但它却可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叙述，这是论文所不能替代的。加之石头出版社反复敦请，盛情难却，我最终同意出此书的中文版。

在台北方面完成了翻译后，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译稿进行校订和改写。改写时，我尽量删去那些对中文读者不太必要的文字，并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是，为了保持文气的连贯，我仍然保留了原著中少数对中国学术意义不大的讨论。改写后的中文版本和英文原著相比，基本的结构和观点没变，但篇幅大约增加了五分之一。

为了方便西方一般读者，英文版《傅山的世界》在征引他人的学术成果时，尽量引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文版做了相应的调整，尽可能多引用中文学术成果，但也保留了一些英文著作。由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中文学术成果很多，我本人在海外，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学者们原谅。

有一个技术问题请读者注意，本书以西历纪年。如康熙十八年转换成1679年。但读者们都知道，中国农历的某年十二月中下旬，很可

能是西历下一年的一月或二月了。用西历的方法来纪年，是为了使那些对明末清初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能有一个清楚的时间框架。但是，本书在处理月日时，仍保留农历的月日。如历史上的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书中写为1679年三月一日。请注意，这是农历的三月一日，若转换成西历，则是1679年4月11日。这样做是因为农历的月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有时有特殊的意义，如农历三月三日是修禊日，四月八日是浴佛日等。

我对傅山的研究始于1992年，至今已有十三年。用十三年来研究一个艺术家，时间不能算很短。但傅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我们对明末清初的许多艺术现象，实际上还缺乏细致的研究。虽然，十三年来，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我深知本书对史料的发掘、解读，对历史现象的阐释，都难免有错误之处。本书的第三章在讨论17世纪下半叶学术风气的转向时，曾引用清初大儒顾炎武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札，顾炎武这样写道：

《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1671）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记》曰：“学然后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当但为称誉之辞也。

顾炎武写此信时，已是近七十的老人了。那时，他早已是清初士林公认的学术领袖，但他对自己最主要的著作，依然抱着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先贤的这种学术精神，我十余年来不敢忘怀。值此简体中文版《傅山的世界》出版之际，敬请知我者与不知我者，攻瑕指失，今后若有再版机会，当予以修正。对你们的指教，我在此先致谢意。

白谨恪

2005年12月24日于波士顿

目 录

总 序	I
谢 辞	III
致中文读者	V
导 言	1
第一章 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	7
晚明：一个多元的时代 8	
尚“奇”的晚明美学 14	
董其昌和晚明书家 26	
古代经典权威的式微 40	
文人篆刻对书法的影响 60	
日益紧迫深重的危机感 86	
傅山在明代的生活 88	
第二章 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	99
动乱的年代 100	
傅山同仕清汉官的关系 105	
历史记忆的典藏 118	
颜真卿的感召力 123	
支离和丑拙 141	
晚明文化生活的遗响 153	

第三章 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	189
1660—1670 年代山西的学术圈 190	
学术的新趋势 196	
学术思潮对书法的影响 209	
清初的访碑活动 215	
碑学思想的萌芽 228	
打破唐楷图式 236	
南方的回应 244	
第四章 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	255
傅山的晚年生活 256	
博学鸿儒特科考试 261	
傅山的行草与草书 271	
结 语	325
图版目录	333
主要参考文献	336
索 引	349

导 言

导 言

① 关于王羲之的书法以及中国书法经典谱系建立的研究甚多，此处仅列举一二，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卷》。西方学界的研究，可参见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米芾和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关于中国古代书法的经典（或称楷模）的形成的讨论，还可参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页1-17。

② 书法意义上的“碑学”一词起源甚晚，它有狭义、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用法仅指晚清以后取法北魏碑版的书法。广义的用法指清初以后取法唐以前二王体系以外的金石文字，以求古朴稚拙趣味的书法，如何绍基、吴大澂学钟鼎文字，也属碑学的创作实践。而出于名家之手的唐碑，则不被列为碑学系统的书法资源。关于帖学和碑学比较清晰的定义，见华人德：《评帖学与碑学》。读者还可参见叶培贵的“碑学”“帖学”献疑一文。

③ 如华人德：《清代的碑学》；王南溟：《清代碑学兴起时期的汉碑隶书创作及其美学意义》；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所收几篇关于碑学的论文；薛龙春：《论清代碑学以振兴汉

以王羲之（约303-361）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书法名家经典谱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初蔚然成为正统。此后的一千年，其独尊的地位不曾受到严重挑战。^①然而，在17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艺术品味在18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②在过去的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虽然治中国书法史的学者都承认碑学的重要性，但相关的系统研究却寥若晨星。关于这个课题的中文学术成果，笔者目前所见的仅有廖新田《清代碑学书法研究》一书，和为数不多的一些散见于书刊中的论文或章节。^③在西方艺术史界，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清代的篆书》是唯一详细研究碑学的西文著作。^④中西学者以往的研究，从政治社会的变迁到学术风气的转变，从晚明书风的影响到书写工具的变化，探讨了碑学形成的多种原因，对我们了解碑学的缘起和发展贡献良多。^⑤然而，对碑学在17世纪开始萌芽的复杂过程，至今缺少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1607-1684或1685）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味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析。^⑥傅山在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⑦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与17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

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不少颇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由于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书法在 17 世纪嬗变的最佳窗口。

本书对 17 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本书在努力吸收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本书所论晚明大众娱乐活动和通俗读物对书法经典观念的影响是一个相关的学术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创作、欣赏及收藏书法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主要是文化精英的艺术。^①当晚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线变得模糊，即使是书法这种高雅精致的上层艺术，也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

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本书在探讨清初书法中的追本溯源的现象和学术界的考据风气的关系时，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 17 世纪山西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以及傅山和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交往。这对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或许也能有所裨益。

对清史研究而言，本书探讨的不仅仅是晚明清初社会中的视觉文化，它同时也对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的描述。本书以傅山与仕清汉官的交往为个案，探讨了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笔者指出，在清初的政治情景中，许多汉族官员都渴望成为遗民的友人或弟子；明遗民们在汉官的保护和

隶为起点》；张爱国：《明末清初的碑学萌芽》等。笔者对碑学的研究兴趣，就是受了老友华人德《清代的碑学》一文的启发。

④ Ledderose, *Die Siegelschrift (chuan-shu) in der Ch'ing-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kunst.*

雷德侯的研究主要着重于 18、19 世纪的篆书，而篆书正是碑学的主要书体之一。

⑤ 在上引著作中，以廖新田对碑学的论述最为全面。

⑥ 注 3 所引华人德、侯开嘉、王南溟、薛龙春、张爱国的文章都谈到了傅山和碑学萌芽的关系。

⑦ 关于近一二十年来的傅山研究，请参见郝树侯：《傅山传》；魏宗禹：《傅山评传》；林鹏：《丹崖书论》；林鹏等：《中国书法全集》，册 63，《清代编：傅山卷》；侯文正：《傅山传》；明清文人研究会编：《傅山》；山内观：《傅山の书法》。

⑧ Ledderose,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of the Elite."

帮助下，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而仕清汉官的赞助也就成为明遗民的艺术与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傅山的一生可以由明清鼎革的1644年划分为时间长度大致相当的两个阶段：晚明和清初。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急剧扩张、思想与宗教生活走向开放、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的界线浮动消融的时代。社会巨变促成了一个蓬勃多元的文化环境。在鼓吹探索内在真实自我的心学的鼓励以及锋芒毕露的城市文化的刺激下，晚明的一些书法家努力在艺术中追求“奇”的特质，使这一时期的一些书法作品具有表现性、戏剧性、娱乐性。随着石材的引进，文人篆刻在晚明蔚然成风。文人篆刻又刺激了书法家书写异体字的风尚。受通俗文化的影响，晚明书法家对古代书法经典的调侃和戏拟，也动摇了帖学传统的严肃性。伴随着传统经典光环的销蚀，晚明艺术潮流的多元化为一些潜流开启了发展的机会，尽管哪种潜流最终可能发展成与帖学争锋的流派在当时并不清晰。

1644年明朝的倾覆并没有令晚明的艺术实践与风格戛然终止，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晚明文化的遗响持续了一段时期。然而，重要的变化也开始出现。朝代覆没的悲剧使许多遗民文化领袖开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经史的研究，以期获得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更为准确的理解。学术风气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给予书法艺术以意义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因考证经史而研究古代的金石铭文，访碑与收集金石铭文成为学术生活的重要部分。书法家们也开始激赏金石文字的古拙质朴，晚明人士已有的对古印破损印文的兴趣，这时发展成对古代金石文字残破古朴的书风的效仿追求。随着碑学在清代中期成为新的书法范式，晚明张扬的狂草也终于消失在已然改变的文化世界中。

傅山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书法家。一方面，他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另一方面，他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傅山一生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学术、艺术的重要事件和潮流密切相关，本书将其近八十年的生涯分成四个时期，并且分析每一时期的书法和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关系。

虽然这一分期方法并没有严格地以傅山书法作品的编年为叙述顺序，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有效地描述和阐释 17 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在讨论碑学和帖学的关系时，受晚清碑学的重要鼓吹者康有为的影响甚大。康有为认为碑学的兴起是“乘帖学之坏”。^①然而，最近的一些书学研究说明，不但在傅山生活的清初，帖学书法十分活跃，^②即使是在康有为生活的晚清，为帖学传薪且有成就者也大有人在。^③况且，清代不少重要的书家都是碑帖并举的。本书的中心人物傅山虽为清初碑学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但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他在晚年还嘱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业”。^④碑学的兴起，固然打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但绝不是取而代之的关系。在 17 世纪以后的三百多年中，两者的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交融的一面。治书法史者于此不可不辨。

①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二》，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页 755。虽说康有所说的“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晚清狭义的“碑学”，但他的这一观点还是影响了某些人对广义的碑学兴起的看法。

② 见傅申：《明末清初的帖学风尚》；又见刘洋名：《笄重光（1623-1692）及京口地区的收藏与书风研究》。

③ 见曹建：《晚清帖学研究》。

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傅山致其弟子段叔玉信札云：“寄将《淳化阁帖》七册，前面背后字上加红圈或一或两不等。劳叔玉兄过朱石上，徐徐勒之。此必传之业，故相烦也（无红○者不可）。弟山顿首。”傅山还称褚本《兰亭序》是“飞行自在，彬蔚陆离，径神物也”。见傅山赠其友人古古之杂书册，载《书法丛刊》，1997 年第 1 期，页 57。

至
之
一
之
并
城
一
之